

評 Ronald C. Po, *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xvi + 292 pp.

林榮盛*

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對外的三場海戰(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均以敗戰收場。此一結果形成長期以來論者歸咎清帝國為一陸地型國家，即便擁有綿延萬里的狹長海岸線，但對於海洋事務並未投入太多關注。甫出版的《藍色海疆——清帝國的海洋視野與力量》(*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即致力修改這樣的刻板印象。¹作者布琮任(Ronald C. Po)是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目前為英國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¹ 本書在英文學界已有書評，其旨趣及關注面向與本文不同，讀者可以交互參閱。參見 Richard S. Horowitz, "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 *The China Quarterly* 237 (March 2019): 284-285, 以及 Tom Marling, "Book Review: *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 by Ronald Po," in LSE Review of Books, <https://blogs.lse.ac.uk/lsereviewofbooks/2018/10/24/book-review-the-blue-frontier-maritime-vision-and-power-in-the-qing-empire-by-ronald-po/>, accessed October 19, 2019; Erin Spinney, "Book Review: Po "The Blue Frontier," in Global Maritime History, <http://globalmaritimehistory.com/book-review-pos-the-blue-frontier/>, accessed October 19, 2019.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歷史系助理教授。其學術興趣為明清海洋史、全球史與邊疆研究，關心課題圍繞著海洋世界，諸如海洋世界如何被想像、被繪製(mapped)，還有被概念化與治理。本書係基於作者 2013 年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並保留主要章節結構。²

作者在導論中指出，晚清中國對外戰爭受挫的「十九世紀陰影」(頁 6)，遮蔽了我們對清廷在海洋事務付出努力的應有認識。藉由重新檢視十八世紀清政府在海疆的治理作為，一方面在於跳脫十九世紀西方、日本列強的影響，一方面也試圖平衡濮德培(Peter C. Perdue)論述清廷在中亞內陸邊疆擴張的印象，甚至有助於開拓出「海上新清史」的研究視角(頁 7)。由此亦可見本書的學術企圖與用心。不過，如若將時間軸往前移，晚明以降「南倭北虜」的外患問題在入清後發生什麼變化？「北虜」游牧民族的威脅，似乎可反映在近年來「新清史」對於內亞統治問題的關注，但「南倭」海上秩序的部分則未引起相似的研究熱潮。就此而言，清廷如何治理海疆有其自身歷史的研究價值，這也能呼應作者強調十八世紀清廷與海上世界互動的學術意義。

全書除了導論、結論，正文共有五章。第一章「背景」(Setting the Scene)，概述東亞海域景觀，主要從地形、季風、洋流等自然環境描寫，說明這些條件對帆船時代的船舶設計、漁業、航路、航季，以及政府海洋政策與制度設計發展的影響。第二章「形塑海域」(Modeling the Sea)，探討盛清時期東亞海域如何形成。相較於前章從較為客觀的自然條件著眼，本章力圖說明清代海域空間的認知其實是複雜的社會建構過程。這一空間認知，建立在清朝皇帝與官員對於沿海疆界

² Chung-yam Po, "Conceptualizing the Blue Frontier: The Great Qing and the Maritime World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Ph.D. Dissertation, Heidelberg University, 2013).

有著「內洋」與「外洋」的區別。對皇帝而言，是從整體政治治理考量出發，因此，對於國家海洋、經濟政策有利之海域即為內洋，否則為外洋。而省級官員傾向將內洋視為其行政治理與政治責任之最大範圍，外洋意味著治理未及之處。此架構直到十九世紀清廷與西方列強簽訂條約，在治外法權的實施下才受到挑戰。

以內、外洋的空間認知架構為基礎，作者進而說明其對清廷治理的影響。第三章「清廷水師」(The Dragon Navy)，證明清廷並無忽視其內洋軍事，而是積極建立沿海防禦。包括山東、奉天、直隸、江蘇、浙江、福建與廣東七處水師基地，以及戰船與沿海堡壘的建設，突顯渤海、江浙、臺灣海峽與廣東四戰略海域的緊密結合。作者強調海上作戰並非十八世紀東亞海域上水師的主要功能，其任務在於運輸、守衛、巡邏、保護貿易、協助圍攻與陸地作戰，並且防止海盜打劫。第四章「監督管理」(Guarded Management)，則是以海關為討論對象。作者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時序，先後梳理海關行政運作的整體變化。由於軍事防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緊密關聯，海關系統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海洋貿易政策階段性的禁弛轉變，也反映在海關管理上不斷變化的情況。作者指出，當貿易政策上升到安全問題，清廷便會以內、外洋架構來調控海關管理，例如對促成「廣州體制」的寧波通商問題。第五章「書寫浪濤」(Writing Waves)。利用三部文人作品：陳倫炯(?-1751)《海國聞見錄》、王大海《海島逸志》與謝清高(1765-1821)《海錄》，說明當時人對於海外國家的認識以及中國在海洋世界的位置。儘管還有更多官方記錄，但作者認為以非官方的記載結合，將能提供更完整的清代圖像。

本書應是第一部聚焦清前期中國海疆管理的整合性著作，包括清廷的海洋空間認識、沿海水師與海關制度。儘管作者宣稱有些課題為西方學者所忽略(頁 25、182)，但中文學界在個別方面已有許多成

果。³這點乍看之下似乎讓本書略顯新意不足，然而，在眾多研究基礎上，本書的創見即在於以「內、外洋」的雙層架構重新看待清廷的海洋政策與制度，進而突顯統治者對於藍色海疆的空間感知。在明清海洋史的廣泛課題中，海防史研究有關地理空間的討論相對有限，且大多集中於沿海地理形勢與軍事駐防之關係。作者以皇帝／文、武官員區分「內洋」、「外洋」的視角出發，認為中國沿海海域的邊界定，實際上是「領土政治」(territorial politics)的結果(頁86)。對於邊疆(frontier)、邊界(border)、領土(territory)課題的探討，一直是學術界的重要議題，但大多集中在陸地部分。作者敏銳地注意到清朝皇帝與官員對於「內海」、「內洋」、「海疆」、「外海」、「外洋」等詞稱使用的細微差異，才得以別開生面有所創新；這也體現在本書「附錄一」(Appendix 1)的材料搜集與整理。這一觀點也有助於重新理解近代以前中國統治者對於邊疆治理的領土概念。過去認為，清廷官員對於邊疆領土與主權的想法是在十九世紀後才由模糊轉趨明顯，特別是牡丹社事件的琅嶠國際交涉。⁴然而，就本書的分析視角而言，清代中國海疆「領土化」(territorialization)與否以及其主權，其實就是統治者政治治理的一部分。換言之，傳統中國領土概念的性質為何，以及十九世紀列強勢力入侵所產生的影響，都值得再仔細思考。

除了論述清廷自身海洋事務的努力，作者也試圖將其置於海洋

³ 對於清代海關、水師與海防研究，讀者可參考陳國棟、李其霖、黃國盛、王宏斌等人之相關著作。特別是陳國棟先生，不僅對明清海洋史有長期耕耘，也指導多位研究生撰寫相關學位論文，是該領域研究的重要推手。

⁴ Lung-chih Chang, "From Quarantine to Colonization: Qing Debates on Territorialization of Aboriginal Taiw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臺灣史研究》，15：4(臺北，2008.12)，頁 1-30。

史、全球史的脈絡下，與西方國家相互觀照。海權(sea power)概念的討論即是一例。十八世紀是清廷戮力於海洋軍事化與海關制度化的重要階段，同時也是西歐航海帝國征服亞洲、東非與美洲的擴張時期。這些航海帝國通常被稱為海權國家，尤其是在美國海軍上校馬漢(A. T. Mahan, 1840-1914)發表經典的海權論著作以後，海上武裝力量的強弱幾乎等同帝國在海外擴張的界限。然而，作者並不認同僅此唯一標準的海權定義。基於歷史發展與區域經驗的差異，作者強調清廷統治者對於管理大片海域的態度與制度性措施，同樣可以達到自身海疆的鞏固，而不必然要進行海外擴張與征服，此亦可視為海權國家的一種表現。透過重新處理海權觀念，促使研究者能夠在更大的框架中相互比較，再進一步做出細膩的歷史描述。

本書的論述主要是以國家為中心的視角出發，故其材料多是官方立場的中文檔案文書。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輿圖，這在第二章有較多發揮。隨著資料數位化典藏的趨勢，許多度藏在世界各地圖書館、博物館的罕見珍本、圖籍得以在資料庫、網路上取得，這使得原本不易接觸到的長卷軸彩色輿圖能為研究者利用。近年來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努力徵集散佚在海外的中文古地圖，包括美國、英國、法國等地典藏之傳統天下圖、分省地方圖與交通圖等，並先做過基本解讀再予以出版，同時亦將圖檔匯入「數位方輿」網站，以饗大眾。⁵本書使用之〈七省沿海圖〉即取自「數位

⁵ 相關出版品包括林天人編撰，《皇輿搜覽——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清輿圖》(臺北：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Washington D. C.：美國國會圖書館，2013)；林天人編撰，《方輿搜覽——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地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2015)；謝國興、陳宗仁主編，《地輿縱覽——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中文古地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8)。另參見「數位方輿」網站，<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index.jsp>，擷取日期：2019年10

方輿(Reading Digital Atlas)」(頁 36)。圖像材料有其特殊視覺效果，相對文字記載更能反映清帝國的「海洋視野」(maritime vision)。數位化的圖像史料，相較於收錄在刊刻出版之方志、文集中的輿圖，在色彩及清晰度上皆有利於欣賞與閱讀。此類材料相信也是日後研究者廣加利用的重要素材。

本書涉及的課題頗多，作者要在有限的篇幅中討論不免有所限制，亦有待商榷之處。首先是問題意識與論旨。作者認為，受到十九世紀中國對外軍事挫敗的影響，論者以為清朝是閉鎖的陸地帝國，而透過重新認識十八世紀清廷在東部沿海的積極作為，則能夠翻轉這樣的印象。這樣的研究策略看似言之成理，但在操作上則有所隔閡。這一落差出現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論述，讀者多可在諸章末節注意到。例如作者提到在乾隆皇帝(1736-1795 在位)駕崩後，清廷水師便快速走向怠惰無能(頁 79、87)；而海關方面也出現官員貪污腐敗的結構性問題(頁 179)。這樣的論述似乎引導讀者接回傳統觀點，認為嘉慶朝(1796-1820)以後清廷走向中衰乃至對外戰敗的歷史發展。事實上，即便證明十八世紀的中國是海權國家，也無法改變十九世紀海戰戰敗的歷史事實，反而強化乾隆朝以後中衰的環節。這一思路背後的邏輯，顯然還留在「十九世紀陰影」中。此外，這樣的論調也許與使用材料的性質有關。本書史料基本上呈現官方角度，這在討論以統治者中心區分內、外洋海域的空間認知固然有效，但在政策與制度運作上，便可能過度放大國家／皇帝的歷史角色，從而忽略制度在沿海社會的具體運作與人群能動性的面相。

月 20 日；美國國會圖書館網站亦有關中國善本古籍之數位典藏，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collections/chinese-rare-books/>, accessed October 21, 2019.

其次，本書在整體上偏重敘述而缺乏對立論史料的細緻分析與論辯。這一部分或許是相關課題已有諸多成果使然，然而，在作者最具創意之「內、外洋」架構論述上，其並未仔細檢證、層次說明使用材料與論點之關係。例如作者強調此一模式是清廷將臺灣併入版圖後才逐漸形成，但僅援引《臺灣兵備手抄》中一條「沿邊臨海五里為內洋」記載，卻未進一步申論(頁 50-51)。讀者不清楚何以成書於同治後期的材料能夠用來解讀清初？⁶而此一手冊式的非正式文書又要如何理解，才能視作清廷中央的觀點與地方官員的普遍做法？又例如作者在內、外洋觀點論述所引用的諸多實錄記載，提醒讀者注意其中內洋、外洋在使用上的區別，但這一區別是否有隨時間演進與地域差異而產生轉變？而清代政府又如何以此空間認知來操作政治？缺乏制度實際運作的個案討論，便使得內、外洋架構的作用大打折扣。又如第二章對於海圖的使用，也僅簡單地說明其所提供的訊息，例如某地為兩省之間或者兩國之間的邊界。然而，如果將地圖繪製以及地名標示、界線劃定視為地方或國家之間政治權力競爭的產物，便能進而思考空間與權力的關係。何以邊界是位於此而非彼，又如何隨時空推移而更動？而在第五章提到十八世紀三位著者的海洋書寫，是與當時歷史地理考證的研究背景有關(頁 190、204)，但缺乏論證，不免讓人以為是想當然爾的連結。簡言之，在諸多論述中，皆能看到作者嘗試提出有趣的觀看視角，至於其中關係究竟為何，以及複雜的歷史過程如何開展，

⁶ 根據夏德儀(1901-1998)的點校、考證，認為「臺灣兵備手抄」即臺灣鎮總兵隨身使用的袖珍本手冊；該書很可能為同治十一、十二年間(1872-1873)，臺灣鎮總兵林宜華任內所使用。參見百吉(夏德儀)，〈弁言〉，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兵備手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據臺灣省立圖書館藏舊抄本排印)，頁 1-2。

卻是待之簡單化了。

另外，本書在材料上的引用解讀與相關研究的引述，亦有不甚精確之處。例如作者對〈七省沿海圖〉⁷上一段文字「歷蓋、復、金等州，轉旅順口」，其中「蓋、復、金等州」，直接簡化譯作「金州島」(Jinzhou Island)，實讓人困惑。而稍後一句的解讀英譯為：「[渤海]東部為山東商人獲利頗豐之處」(頁 59)。事實上，海圖原文為「天津右表東南，則山東之利津等縣」，意即由天津向右往東南延伸，則為山東之利津等縣。作者將天津讀解為渤海東部，既不精確也未必適當。至於「利津」實為山東一縣名，其在海圖之位置即在此段原文上方(頁

⁷ 事實上，此圖應為「海疆洋界形勢全圖」。本書將此圖與「數位方輿」另一〈七省沿海全圖〉(典藏編號 A103000139)，皆以「七省沿海圖」之名交相混用。〈七省沿海全圖〉為江蘇江陰人金保彝於光緒七年(1881)所摹繪。至於〈海疆洋界形勢全圖〉則有兩個版本，典藏編號為 A103000137 與 A103000138。此二圖繪製者不詳，研究者初步認定係以陳倫炯之《沿海全圖》及《天下沿海形勢錄》之文字為藍本，再加以修改，繪製時間介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至嘉慶五年(1801)間。本書所稱「七省沿海圖」之圖 1.1、2.2、2.4、3.7 實為編號 A103000138〈海疆洋界形勢全圖〉圖檔；圖 3.2、3.3 則為〈七省沿海全圖〉。此便引出本書在與圖使用的另一問題，即對與圖作者、版本等基本訊息未詳加說明與探究。儘管作者標註「1780 年代版本」、「1880 年代版本」、「十九世紀版本」，但為何時而用此版本、時而以彼版本，卻未有解釋。由於圖像常有不同年代的繪製版本，其圖說亦隨之有所損益，若不加以分析生成之歷史脈絡，逕取表面訊息，則可能造成時空錯置的解釋。此三圖亦收入《皇輿搜覽》(頁 318-330)，讀者可逕自參考。〈七省沿海全圖〉，典藏編號 A103000139，網址 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3000139，擷取日期：2019 年 10 月 21 日；〈海疆洋界形勢全圖〉，典藏編號 A103000137，網址 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3000137，擷取日期：2019 年 10 月 21 日；〈海疆洋界形勢全圖〉，典藏編號 A103000138，網址 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3000138，擷取日期：2019 年 10 月 21 日。

57, 圖 2.2), 而非山東商人「獲利之處」; 至少這類訊息在此圖上無法得知, 也不常見於軍事交通屬性且多半係記載地理位置、道里路程之輿圖。作者在引用史料並加以翻譯時, 有修改、刪減原意, 甚至是添加之情形; 如上述原文便無指涉商人, 而作者翻譯卻不慎加入。⁸儘管本書對材料的解釋, 意思上似未悖離原文太多, 但簡化或省略其中的某字、某句而未譯出, 或者增添原文未有之文字, 閱讀上就可能產生去脈絡化與誤導、誘導讀者之問題。此外, 在第四章討論乾隆朝海關一節, 作者論述中國沿海的八大貿易航線與航路圖(頁 164-167, 圖 4.1、4.2), 係參考學者黃國盛之研究。雖然作者在該章最初一語提及時已有註明(頁 144), 但相距二十頁再做大幅論述而未加註, 亦容易引起讀者誤解。本書也出現多處明顯錯誤。例如將盛京誤作承德(Chengde, 頁 60)、清廷征服臺灣之時間為 1683 年(康熙廿二年)而非 1693 年(頁 79), 以及陳昂([1652-1719])、陳昂名字不一致的混用(頁 153、189);⁹類此更多的不一致, 是在正文註腳出處以及參考書目, 後者在一、二手資料上也是分類不清。這些看似細瑣而無關宏旨的瑕疵, 在讀者看來卻顯得突兀並產生混淆, 宜盡可能避免。最後, 本

8 讀者若稍加對照史料原文與英文譯文, 即會發現查找並不容易, 因為譯文大意已經作者修飾。僅例舉一二, 如頁 64 註 53、頁 91、頁 160 註 65、頁 161 註 66、67。令人不解的是, 在轉引其他學者援引的史料亦作修改, 例如作者引用美國學者何蘿娜(Laura Hostetler)之名著《清朝的殖民事業——近代中國早期的民族誌與地圖學》(*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其中何蘿娜所英譯法國傳教士之材料, 參見頁 154 註 46; 儘管使用材料囿於語言限制, 但如此片段的轉引仍有「斷章取義」之風險。

9 事實上, 陳昂應作陳昂。對此向為研究者所忽略、混用之細節處, 已有學者細緻討論, 參見陳國棟, 〈陳昂與陳瓚——康熙五十六年禁止南洋貿易的決策〉, 收入陳熙遠主編, 《覆案的歷史——檔案考掘與清史研究》, 下冊(臺北: 中央研究院, 2013), 頁 433-467。

書索引僅有兩頁，這對於正文超過兩百餘頁的學術論著而言，既過於簡略，也有實際閱讀上之不便。

總之，作者在既有可觀著述的研究領域中另闢蹊徑、力陳新論，著實令人激賞。作者提出清代國家對於海疆的空間認識，是社會建構的歷史過程，此一觀點已足以刺激我們重新思考清廷的邊疆治理與領土主權等諸多課題。儘管本書在論證上猶有未盡人意之處，但興許反映出清代海洋史還有許多猶待開拓實證、論述的空間。

(本文於 2019 年 8 月 1 日收稿；2019 年 11 月 26 日通過刊登)

* 本文承蒙審查人提供諸多寶貴意見，謹致謝忱。